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徐正英 陈芳兵

摘要: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关键词: 颂体;铜器铭文;结构;生成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1-0145-07

《说文解字》解“颂”为“兒(貌)也”^{[1]181},籀文写作“𠂔”,本义为人的容貌,后“容貌”之意逐渐被假借字“容”使用,“颂”仅使用其引申义。我们讨论“颂”作为文体时,更多使用的是其引申义。刘勰这样论述颂体的起源、发展以及基本特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自商以下,文理允备。……《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2]156-157}刘勰认为颂的本质和功用是赞美盛德,故将颂与赞放在一篇进行分析,并于《宗经》中强调“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2]22}。《诗经》中的“三颂”,保留着大量的颂体诗歌,将颂美之意强化固定,“规式存焉”,成为“颂体”的创作范本。韩高年也主张颂诗起源于祝祷活动,是用于仪式的赞述之辞^[3]。除此之外,先秦传世文献中记载有不少“颂”的其他含义,段立超的博士论文《上古“颂类”文学精神及其体类特征》中,归纳总结了“颂”在先秦的九种含义特征,分别是歌颂赞美祖先、宗庙祭祀之歌、“舞容”、舞乐剧本、乐器、威仪及仪式表演、

持瓮之舞、宗教颂辞、仪式叙述,并进一步梳理“颂”作为口头即兴的颂扬之作、占卜之颂、为各种仪式所作之颂等几种体类^[4]。西周铜器铭文之“颂”符合段立超博士论文中的两种含义:一是歌颂赞美祖先,例如《番生簋盖》开篇即颂赞皇祖考,“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二是仪式叙述,例如《遯簋》中的“遯拜首稽首,敢对扬穆穆王休”,描述在某特定的仪式上颂赞者的语言行为。本文即从这两重含义来考察颂赞性铜器铭文。这一文体的起源不应是刘勰所说的《诗经》“三颂”,而应当追溯至更早。铜器铭文中已存在大量“颂”体的因素——或依附于册命文本之后,或独立成篇,表现出一定的文体意识。

一、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与特征

目前可见的西周颂赞性铭文有 400 多篇,时间贯穿整个西周各期。铭文句式、结构特点、年代分布、

收稿日期:2022-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17ZDA254)。

作者简介:徐正英,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陈芳兵,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颂赞对象以及颂赞原因等情况较为复杂。本文依据能否在一个较为完整的含义模块中(可以是一篇铭文或一段铭文)集中进行颂赞性文字表达这一标准,将西周的颂赞性铭文文体分为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类。

1. 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

该类铭文仅是简短的套语表达,尚停留在一个句子之内的语序或词语变换,故笔者在分析过程中将注意力放在分析铭文句子内部结构上。依据其谓语部分核心词的不同,这类铭文可分为“对扬”“敢对扬”“用对扬”三类。

“对扬”类是指谓语部分仅有“对扬”二字的颂赞性铭文表达,其标准结构为“××+对扬+××+丕显+休+命”。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中,《史墙盘》(《集成》10175)的“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敢对扬”类颂赞性铭文是指谓语部分在“对扬”前加上“敢”字的铭文句式。“敢”字西周时才出现,金文中写作𠂔,本从口,从二手上下相叠状。本义表示有胆量、勇于进取。《说文》收录“敢”的异体字𠂔,解为“进取也”^{[1]84},后逐渐发展为谦辞,有冒昧之意。马承源先生也认为“敢”是敬助词,是金文中常见的西周贵族习用语^[5]。“敢”在金文中一般用于下级对上级的语境中,表示身份地位的差别。其标准结构是“××+敢对扬+××+丕显+休+命(令)”,《申簋盖》(《集成》04267)的“申敢对扬天子休令”和《山鼎》(《集成》02825)的“山敢对扬天子休令”,铭文颂赞部分均是完整的“敢对扬”类标准式。“用对扬”类颂赞性铭文是指谓语部分在“对扬”前加上“用”字,其标准结构为“××+用对扬+××+休”。同前两类相比,“用对扬”类铭文数量极少,仅7例,目前只能说明曾经出现过这种颂赞形式,不能断定这一模式曾经作为一种主流现象出现。其主要的结构表达为“××用对××休”。

除此之外,上述三种结构更多的是一些变体。例如为了表达简洁,省去主语(即颂赞者)的简写式。这类情况前一句一般会有“××(颂赞者)拜首稽首”的表述,为避免重复,后半句不再使用主语。例如《伊簋》(《集成》04287)的“伊拜首稽首,对扬天子休”,《遯簋》(《集成》04207)的“遯拜首稽首,敢对扬穆穆王休”,《小子生尊》(《集成》06001)的“用对扬王休”等。亦有对谓语部分不同程度的省略,简化为“对”或“扬”,这类情况在铭文中俯拾皆是,如《作册折觥》(《集成》09303)的“扬王休”和《趯尊》

(《集成》05992)的“趯对王休”等。另有不同程度省去宾语部分“休”“丕显”“命”等内容的简写式,例如《庚嬴卣》(《集成》05426)的“庚嬴对扬王休”,《楚簋甲》(《集成》04246)的“楚敢拜首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等。

还有少量比较委婉的颂赞性铭文文本,只能称为颂赞方法。例如《猷钟》(《集成》00260)的“王肇通省文武勤疆土,南国戾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毕都,戾子乃遣闲来逆昭王,南尸东尸具见,廿又六邦”,详细地描述了戾国侵犯疆土时,王率军迎敌并战胜对方的英勇身姿以及东南夷臣服的盛况,作器者背后表达的颂赞意图不言而喻。

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贯穿整个西周时期,数量较多,是铭文中颂赞意图的主体表达。其中,西周中期铭文句式变化多端,表达形式丰富多彩,展现着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在此阶段的繁荣。

具体来说,西周早期铭文的颂赞方式主要是“对扬”类,有63篇,远多于“敢对扬”类铭文的9篇和“用对扬”类的5篇,是西周早期非独立成篇类颂赞铭文的主要构成。其表达形式均为“休”之前无修饰成分的“(××)对扬××休”和“敢对扬××休”等模式及其变体。

西周中期,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呈现出繁荣多元状态。“敢对扬”类和“对扬”类分别为122篇和109篇,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类型。出现句式内部的修饰成分,常见的表达形式是“敢对扬××丕显休”“敢对扬××丕显鲁休”和“对扬××丕显休”等,为几种句式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西周晚期,三种类型的非独立成篇的颂体铭文均表现出数量下降的趋势。“敢对扬”类铭文仅有46篇,多于“对扬”类铭文的19篇。铭文中较多出现修饰成分“对扬××丕显休”的表达,句式有繁有简,同之前相比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经过西周漫长的发展演变,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文体特征,大致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因事而发,被动颂赞。非独立成篇类铭文通常会在叙述中表明受到上级的赏赐、任命或赞扬,对此进行回应式感激和颂赞。例如《师俞鼎》(《集成》02723)记载师俞跟从王到上侯,师俞针对王的赏赐作回应式感谢和颂赞“俞则对扬厥德”,既是对王赏赐的感谢,又是借此机会对王的颂赞。又如,《师遽簋盖》(《集成》09897)中“遽拜首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也是针对“王呼师朕赐遽贝十朋”做

出的回应性颂赞。类似的文例在金文中不胜枚举,大量类似的逻辑和表述,形成了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因事而发的颂赞特点。

第二,篇幅较短,多依附于其他文体。由于此类铭文颂赞的目的多为对赏赐或任命的感谢称扬,故行文一般依附于册命体、记体等,不单独成篇,颂赞内容相对于整篇铭文来说,占比较少。颂赞部分存在于铭文对事件的详细叙述之后,是仪式事件的组成部分。例如,吴震烽所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下简称《铭图》)中,《作册吴盃》(《铭图》26卷224页)完整地叙述了王在觐“执驹”,有所获后在唐门召见作册吴,并赏赐其驹。铭文简略地记载了作册吴在仪式流程上的行为和语言,“拜稽首,受驹以出,吴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其中颂赞性铭文仅有“吴敢对扬天子丕显休”9个字,同全篇60字左右的铭文相比篇幅较短,表现出该类铭文依附于其他文体存在的特征。

第三,颂赞对象多为在世之人。非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因其现实的颂赞目的,所称扬的对象除《匚簋》外均是针对当世天子或上级。其中“敢对扬”类铭文以颂赞当世天子居多。西周中期,随着册命礼仪的完善,史官开始代王授册宣布册命内容,颂赞时为了凸显下级与上级的身份差别,以示对被颂赞者的尊重,“敢对扬”类颂赞性铭文数量迅速增加。“对扬”和“用对扬”类颂赞对象的身份则无明显的差异,既有当世天子,又有贵族、重臣等,在使用上并无严格的限制。

第四,多为模式化的套语表达。该类颂赞性铭文表达模式的改变尚停留在一个句子之内的语序或词语变动,内容变化不大,多为简短的模式化表达。核心词语是“对扬某休”,铭文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修饰词的增减,在上文的结构分类中已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和举例,此处不再赘述。

第五,器物类型以食器为主。该类颂赞性铭文所属的器物类型主要集中在食器上,尤其以簋器居多,鼎类次之。其余有酒器(主要是尊、卣和极其少量的彝、壶等)和水器(主要是盘,另有少量的盂)。在西周中期后段出现了少量的钟,没有兵器、用器等类型的器物出现。纵向来看,西周早期的器物类型较为单一,以食器为主,数量也较少。中期器物无论是在总数上还是食器数量上都占绝对的优势,晚期酒器数量急剧下降,仅剩食器、少量的水器和乐器。

2. 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文体

该类颂赞性铭文指的是能够于集中的文段中,

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或出于某种目的进行颂赞性表达。这虽然不是后世真正意义上成熟的颂体文,但已不局限于对获得赏赐或册命后的感谢颂赞,而是为表达某种思想,主动颂美祖先或者天子的光辉和伟大。依据行文构思和板块布局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叙事+颂祖”和“颂祖+祝祷”两种结构类型。

第一,“叙事+颂祖”类铭文共11篇,其所叙事件有“军事活动”和“册命仪式”两种类型。颂赞者在所叙事件中获得较高的荣耀,将所获荣耀归功于先祖,称颂其光辉的品德,铸器铭之。

在具体行文中“军事活动+颂祖”类铭文包含“叙述军事活动+归荣耀于祖先+效法祖先+颂美祖先”等板块。穆王时期的《班簋》《貳簋》《貳鼎》,厉王时期的《猷钟》《禹鼎》均属于这一类型。行文多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事件,交代军事活动的基本要素和战争情况,进而以第一人称视角和口吻将此事事件中的荣耀归功于先祖先王,告祭成功、颂美祖先。例如《貳簋》(《集成》04322)开篇以第三人称记载貳在胡地搏戎一事。进而称颂母亲,其品德熏陶影响自己,故而自己英勇征战,军功赫赫。最后,战斗结束,再次称扬母亲,并向其祝祷,祈求保佑。

“册命活动+颂祖”模式类铭文共有6篇,包含“颂赞祖先+孝型祖考+勤劳王事+受王册命+赞美祖先”等板块。大多数铭文是“先颂祖再记叙册命赏赐”的结构。例如《番生簋盖》(《集成》04326),铭文开篇颂赞皇祖考,“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颂祖部分大多是套语表达,以祖考为榜样,番生表示要效法皇考祖先,勤劳王事。紧接着铭文还记录了王的册命和赏赐,但仅有册命内容和赏赐物品,并未记载册命仪式的细节。作器者将赏赐物品一一罗列,无不透露着张扬、炫耀之意,进而以番生称扬天子美好结束铭文。

综上所述,“叙事+述祖”类颂赞性铭文文本结构有较强的规律性,在颂赞中表现出一定的仪式痕迹,是祭告祖庙或册命拜谢仪式的产物。颂赞部分自身既是一个含义较完整的独立个体,又与叙事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与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不同,颂赞者不再单纯对扬天子,更多将取得的荣耀归功于过世的祖先,认为自己正是在祖先精神的指引下才取得当下的成绩,对祖先的德行与光辉形象进行主动颂赞,是西周中期礼乐革新的产物。

第二,“颂祖+祝祷”类铭文主要由“颂赞祖先+孝享祖先+效法祖先+祝祷祈福”几大模块构成。铭文多以“颂赞者曰”的第一人称记言形式开启全文,

没有明显的叙事痕迹。少部分铭文甚至出现无记言标志的直接颂赞。铭文一般在颂扬祖先美好的德行之后,表达自己要以此为榜样,勤勉努力,进而向祖先祝祷保佑。这一类型的颂赞铭文祭祀仪式的痕迹已经较弱,不再强调对活动细节的记录,着重表达创作者的某种思想。

大部分铭文有“××曰”这一明显的记言标志,例如《师望鼎》《速盘》《癸钟》等。《师望鼎》(《集成》02812)没有进行颂赞契机的背景介绍,开篇直接借师望之口颂赞父考:“丕显皇考克公,穆穆克明厥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得纯无愆。”称赞父考圣明地明其心,知其德,为先王奔走。在这一逻辑基础上,王不忘“我”是先祖之后,多次夸赞、重用“我”,师望称扬天子的美好,并进行“子子孙孙永保用”的简单祝祷。

无记言标志的颂赞模式,是较为少数且独特的存在。例如《史墙盘》(《集成》10175)、《癸钟》(《集成》00246)。《史墙盘》独立成篇,通篇颂祖述祖,不仅未提及任何仪式或者创作缘由,也未向祖先进行祝祷祈求。铭文对西周历任天子和微氏祖先进行罗列式的颂赞,且均不是套语式表述,而是叙述历任祖先的事迹,抓住其突出特征或功绩进行的称扬,例如认为“文王”是“懿猷初于政”,“武王”是“讯圉”的形象,“宪圣成王”等,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意识。

综上,“颂祖+祝祷”类的颂赞性铭文虽产生于一定的仪式,但其对仪式的记载逐渐淡化。乐器类铭文的出现,为颂赞性铭文注入新的表达活力,孝享祖先的场合中,述祖类颂赞性铭文的叙事契机逐渐消失,着重进行思想的表达。铭文的叙事性逐渐减弱,转而向记言和描述的方向发展。该类铭文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文学创作技法上,都是较为发达的一种颂赞性铭文模式,蕴含着“帅型祖考”的思想,代表着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的新变之一。

同非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近400篇的总数相比,该类铭文的总数相对较少,共22篇。其中“叙事+颂祖”和“颂祖+祝祷”两种结构的铭文数量大致相同,均是西周中期出现,至晚期仍然存在。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尽管数量较少,但其时代特征鲜明。突出的文体风格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出现非模式化颂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在西周中期后段和西周晚期出现了非模式化的颂赞表达。同非独立成篇颂赞性铭文相比,该类颂赞性铭文不再是笼统的“扬王休”式赞美,而是以生动的语言具体地颂赞祖先不同的优点。《史墙盘》

(《集成》10175)中,作者详细历数了先祖先王的丰功伟绩,具有针对性和细致性。铭文写道“初懿猷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抚有四方”,侧重于文王受天命这一重大事件;颂赞武王,则是“讯圉武王,逖征四方,挾殷,峻民永不恐狄”,突出的是武王平定四方,建立政权。对成王、昭王以及微氏历任祖先的颂赞,均是此类细致具体的描述,而非模式化颂赞。

第二,颂赞性铭文篇幅变长。西周中期开始,颂赞性语言在整篇铭文中比例大幅上升,出现大段的颂祖表。中后期的《史墙盘》《癸钟》甚至单独成篇,进行颂美。这正是由于上文所述铭文颂赞内容逐渐具体化,故其篇幅自然较“对扬”类铭文要长。例如《虢叔旅钟》(《集成》00238—00244)中颂赞篇幅占全文的44%。类似的文例还有很多,无不体现了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篇幅变长这一特征。

第三,简化颂赞原因。此类铭文不再是回应式的“对扬”颂赞,多是在祭祀仪式上对祖先进行的自发回忆和称扬。颂赞的原因和契机不再是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在“帅型祖考”“大祭祖先”等思潮的影响下,对祖先进行孝享的过程中,以历史的视角细数祖先功业,塑造祖先形象,并以此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后人。相关思想都在铭文的称颂和祝祷中进行了充分的表现,因此为避免重复,铭文在写作时对其原因部分进行简化处理。

第四,颂赞过世祖先。这类颂赞性铭文的共同特征是鲜少对在世天子或上级颂赞,而是不同程度称扬自己的祖先,有些甚至会在颂赞祖先的基础上颂扬西周的先王,这是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出现的又一新特征。例如《班簋》(《集成》04341)中班接替虢成公官职,率军东征。战胜归来复命之时,所称颂的主要是自己的先祖。颂赞对象的多元化,侧面反映了西周中期颂赞需求的多元化,体现出颂赞铭文的发展。

第五,乐器数量增加。不同器物的功能不尽相同,导致铭文指向性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对铭文内容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进入西周晚期之后,以钟为代表的乐器在颂赞铭文的器物类型中比重上升。乐器上所铸刻的颂赞性铭文多为“颂祖+祝祷”类,这与钟在使用中娱神孝享的功能有关。多篇铭文均提及铸钟的目的是为了孝享祖先,通过演奏美妙的音乐,使其愉悦。在这一过程中,颂赞祖先顺理成章。在此基础上,向愉悦的祖先寻求祝祷和保佑,逻辑合情合理。例如“颂祖+祝祷”类铭文中,乐器占到60%，“叙事+颂祖”类铭文中也有两例乐器,同非

独立成篇类铭文相比,这是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的又一重大变化。

二、西周颂赞性铭文文本的生成

在详细分析颂赞性铭文的类型及结构基础上,凭借铭文的发展趋势和状态,我们可对颂赞性铭文文本在西周的生成方式进行大致的还原。郭英德先生认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6]铜器铭文的功能之一便是作器者因军功、赏赐,铸铭记录或炫耀及自我保护,因此必然会附带对君主或上司的称美和赞颂。西周康王时期开始较为频繁地将颂赞性铭文用于受命、受赐等庄重的场合,与仪式关系密切。此时西周度过了初期的立国阶段,政治秩序逐渐建立,王室和国家的经济力量恢复发展,派官员出使慰问诸侯、联络宗族感情,命将军进行军事行动,镇压不臣的周边政权。昭王时期更有频繁的军事活动,发布军事任务或任命将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自是不可缺少的主要活动,许多在祭祀中办事得力、表现优秀的官员,都是天子或大贵族进行赏赐的对象。颂赞性铭文文本便是产生于册命或祭祀仪式的口头文字。据铭文所载,天子(或其他大贵族等上级)进行任命或赏赐之后,受命者(受赐者)有拜首稽首并称扬谢恩的礼仪,史官在对拜首稽首这一仪式进行记载的过程中,将受赏者所说的颂赞语言同时予以记录。在这一过程中,口头文字变成了书面文字,发展出了早期最简单的颂赞性铭文。颂赞性铭文文体的生成离不开相关的仪式和史官对文字的加工。在不同的时期,文本创作者所关注和记载的重点有所差异,技法的成熟度也不尽相同。在生成初期,颂赞仅为记事附庸,铭文对仪式的记载痕迹较重。后期随着颂赞性文字的逐渐发展,文本的目的由记事转向记言,记载仪式性的笔墨越来越少,颂赞语言的独立性增强,书面写作也逐渐完善发展起来。李冠兰《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一文,在探究口头文字转化为书面文字方面,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思路^[7]。依据颂赞性文本所呈现的状态和特点,下面我们将分别从两种类型出发,探究二者的生成过程。

1. 记事为主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式

这是西周早期颂赞性文本生成的主要模式,多

见于铭文文献中,因事而发,颂赞对象多为在世之人。此类颂赞性铭文文本的记录者同时也是仪式流程的参与者,对仪式的相关要素进行记录,结束后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对事件进行第三人称视角的复述,涉及事件中的人物语言时,则以第一人称的话语原样抄录,插入其中。文本内部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语言表达较为质朴,颂赞部分套语化倾向明显。例如《乖伯簋》(《集成》04331):“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忘小裔邦,归咎敢对扬天子丕杯鲁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几王尊簋。”这里“乖伯拜手稽首”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叙述乖伯的动作,解释为史官对于事件的旁观描述更符合逻辑。但下一句就更像是乖伯在赏赐现场的语言“天子休弗忘小裔邦,归咎敢对扬天子丕杯鲁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几王尊簋”,天子没有忘记我们小邦,我在这里冒昧地称扬天子的光大美好,为我的皇考乖几王铸造尊簋。另外,铭文中有两处以“曰”为标志的语言记载,应当是对仪式上话语所进行的有选择且非连续性的记录,表现出口语化的痕迹。《矢令方彝》《即簋》《吴方彝盖》等均表现出类似的文本特征。

2. 记言为主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式

这是西周中期较为重要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式。铭文通篇以记言为主,颂赞对象多为去世之人,如先祖先王等,文本产生根源多为宗庙祭祀,对文本的技巧和表达要求也更高。此类铭文并非对口头语言的记录和转述,更像是提前写好的文本,使用于实际场合后,再由铸器者铸铭记载。文本呈现出仪式性淡化的特点,将颂赞者的语言从事件中剥离,使其不再单纯是事件的附属品。创作者秉持一种创作的态度,交代清楚事件不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整理颂赞语言传递某种思想成为更重要的目标。此类文章布局严密,逻辑连贯,句与句之间衔接流畅,呈现出典雅的书面文字特征。多数有一定的韵脚,句式整齐,甚至使用了修辞手法。较为典型的有《史墙盘》,其篇幅较长,没有明确的记言记事痕迹,仅从篇末“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用乍宝尊彝”一句推知应该也是某一仪式产物。铭文结构严谨,对西周历任天子的评述和形容精确得当,尤其是大量出现“迨受万邦,韜圉武王,逖征四方,挾殷峻民”这样整齐的四字句式,用词文雅,朗朗上口。甚至《史墙盘》(《集成》10175)中还出现了“申宁天子,天子固纘文武长烈”以及“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这样的顶针修辞手法,与传世文献《诗经》《尚书》中的句式高度相似,更加印证了这类铭文的生

成经过史官的推敲、斟酌、润色和修改,不是简单的口头语言记载。如此长的篇幅和严密的逻辑,显然不是史墙的临时发言,将其看作提前写好的案头文字更加合理。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速盘》铭文思路与《史墙盘》相似,篇幅很长,用词考究,并且出现了“零朕皇高祖……”的排比句式。《集成》中收录的两篇《癸钟》铭文,在行文和语言风格上与《史墙盘》和《速盘》非常相似,呈现出书面创作的特征。

三、西周颂赞性铭文与《诗经》中的“周颂”

与《诗经》“周颂”较为成熟的颂赞性文本形态不同,西周颂赞性铭文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过程。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受军事和册命活动的影响,在西周早期蓬勃发展。演变至中期,其中的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周颂”的文本状态已十分相近。不同的是,铭文较“周颂”表达更加原始,语言更加质朴。后者是对前者有选择地继承并进一步润色加工的产物,是颂赞性文本演化至西周中期的新形态。

第一,二者蕴含着西周中期特有的历史思潮和时代精神。西周中期通过整理和书写历史,重新塑造祖先形象,称扬凸显其光辉的品德、威仪、功绩,这是中期礼乐革新“大祭祖先”之意。二者均以“光大”“美好”之意盛赞先祖先王,例如《维清》中的“维清缉熙,文王之典”,与铭文中《番生簋盖》(《集成》04326)的“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和《虢叔旅钟》(《集成》00238—00244)的“丕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语言表达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帅型祖考”便顺理成章。通过“大祭祖先”,勉励大家效法先祖先王,遵循前人之路,夙夜勤勉为王奔走。与铜器铭文相比,“周颂”作为官方创作整理的宗庙歌辞,对这一思想表现得更加清晰和系统,呈现出后出的文本特征。《维天之命》《维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称扬文王的德治和武功,《桓》《赉》《般》则是通过恢弘的歌颂再现武王克商、赐封功臣以及巡狩山川的勇武形象。在对祖先的回顾和颂赞中,共同追溯西周早期历史以及祖先们的光辉,进而以此为榜样,不懈于治。“周颂”多是从天子的角度进行的颂赞,适用于级别较高的祭祀活动,效法的对象是西周先王,例如“仪式刑文王之典”(《我将》)。而颂赞性铜器铭文的作器者更多是诸侯、大夫,铭文涉及家族事件或者个人功绩,故

其“大祭祖先”和“帅型祖考”之“祖”更多是家族先人,例如《师望鼎》(《集成》02812)的“肇帅型皇考”、《单伯吴生钟》(《集成》00082)的“余小子肇帅型朕皇祖考懿德”。但铭文对祖先的颂赞模式和祝祷思路,与“周颂”是一致的,均是西周中期特有文化思潮下的产物,“周颂”在行文布局和篇章安排上较铭文更有文学性。

第二,二者祭祀和仪式痕迹明显。西周颂赞性铭文是一定册命、祭祀、告庙等仪式活动的产物,《诗经》“周颂”则是为不同祭祀所创作的吟唱颂辞,它们均具有一定的实用语境。不同的是,颂赞性铭文中的仪式痕迹较为明显直接。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大多有“拜手稽首”的仪式标志,部分甚至有“以出”的后续流程描述。例如《作册吴盃》(《铭图》26卷224页)“吴拜稽首,受驹以出”。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中则有较多孝享祖考的语言,彰显着铭文在祭祀仪式上实际的功用。例如《士父钟》(《集成00146》)“作朕皇考叔氏宝林钟,用喜侃皇考”,以及《癸钟》(《集成》00260)“王对乍宗周宝钟,仓仓怱怱,肃肃雍雍,用昭格丕显祖考先王”,旨在以钟声孝享娱乐先祖先王。“周颂”是为祭祀歌唱而进行的文学性创作,祭祀痕迹较为委婉,但仍不难细品出其宗庙颂歌的性质。例如《我将》中的“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潜》中的“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载见》中“率见昭考,以孝以享”等,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祭祀的隆重场面。“周颂”对仪式的表述脱胎于颂赞性铭文,但其委婉的文学化表达则是颂赞性文本的又一进步。

第三,二者在祭祀之后都表达出向祖先祝祷祈福的意愿。颂赞是祭祀的题中之义,而祭祀的目的之一在于祈求祭祀对象的保佑。铜器铭文和“周颂”的行文思路均在颂赞祖先之后伴随着对未来的祈福。祝祷祖先保佑自己,祈盼国运昌盛、子孙万福,希望庄稼丰收等。前文详细分析过的“颂赞+祝祷”类铜器铭文,其内容和行文思路便是这一文本特征的典型再现,此处不再赘述。《诗经》“周颂”中类似的文例俯拾皆是。有隐晦的祝祷保佑,例如《维天之命》中的“假以溢我”,《时迈》中的“允王保之”。还有直接热烈地请求降福,例如《潜》中的“以享以祀,以介福景”,《雝》中的“绥我眉寿,以介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甚至在祈福祝祷部分,《诗经》与铭文中有不少极其相似的语句。例如《维清》中的“惠我无疆,子孙宝之”与《士父钟》的“降余鲁多福无疆”(《集成00146》),前者比后者语句

更加工整,朗朗上口,是经过加工润色后的产物。

第四,二者多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进行表述。铭文和“周颂”虽均来自于祭祀仪式,但其展现出的文本状态略有差异,最明显的便是创作视角的差异性。《诗经》的“周颂”每篇中人称较为统一,例如《我将》通篇以第一人称歌唱,祭祀孝享文王、上帝。《载芟》则是全文第三人称,热情而详细地为听众歌唱了秋收时节的盛况,颂赞土地谷神。总体来看,《诗经》“周颂”中以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较多,第一人称歌唱相对少一些,但每篇仅保有一个人称视角。这是因为“周颂”是由周王室整理编订用于祭祀场合这一特定语境中演唱的宗庙歌曲,为便于在仪式上使众人听懂,因此人称固定,内容简约,较少背景事件的叙述,而是直接颂赞歌唱,以便在类似的祭祀场合反复吟唱。但颂赞性铜器铭文一般是第一、第三人称混合使用,是颂赞性文本的较早形态。它并非用于歌唱,也无须在场所有人知晓,而是出于对某一具体事件以记载为主要目的的需求,故在文本的写作中需尽可能完整地涵盖活动的各个流程及相关要素,方能全方位地再现事件,铸铭记之并传之后世。

当然,颂赞性铭文与《诗经》“三颂”的关系远不止于此。“周颂”和“商颂”中大多数篇章的颂赞对象是已过世的先祖先王,与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中“颂祖+祝祷”模式一脉相承。《鲁颂》中的颂赞对

象较为多元,如颂赞在世的鲁公、宝马良驹等。这是从非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发展而来,继承其“对扬天子”的思路,但较之更加主动,将“颂祖+祝祷”类铭文中颂赞祖先的描述性手法继承下来,用于对现世上级的称扬。另外,在颂赞技法、颂赞语言等方面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综上所述,西周颂赞性铭文经过漫长的演变,在不同生成方式的作用下,发展出多样化的结构类型。西周中期的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为《诗经》“周颂”提供了借鉴。在继承颂赞性铭文的基础上,“周颂”演变出较为成熟的文本状态,实现了颂赞性文本的书面转化和文学表达,进而逐渐发展出后世传统意义上的颂体文学。

参考文献

-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2]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 [3] 韩高年.颂为“仪式叙述”说[J].甘肃社会科学,2002(5):103-106.
- [4] 段立超.上古“颂类”文学精神及其体类特征[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 [5]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57.
- [6]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
- [7] 李冠兰.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36-44.

The Structure and Generation of Praise Inscription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Xu Zhengying Chen Fangbing

Abstract: Praise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style,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s for the origin of praise style literature, Liu Xie thought it was from “San Song” in *The Book of Songs*. In fact, as early a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inscriptions already expressed the content of praise,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structural types: non-independent praise inscriptions and independent praise inscriptions. The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er is a passive praise to the living people based on food utensils, and the latter is a schema-less praise to the ancestors. There were two generation methods of praise inscription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chronicle inscriptions were the records of relevant event elements by historians and the third person touch up, and the inscriptions based on people’s speeches were likely to be pre-writt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aising texts, the independent praise inscription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Zhou Song” in *The Book of Songs*. The latter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later praising literature.

Key words: praise; bronze inscriptions; structure; generate

责任编辑:采 薇